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视域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李全喜, 李培鑫

摘要: 西方生态政治学是特定西方语境下政治社会变革和学术话语塑造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破解了西方生态政治学对生态政治现象的意识形态遮蔽, 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知识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 充分彰显出构建中国自主生态政治学理论的自信与自觉。其原创性贡献表现为: 在社会主义原则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深刻揭示了生态政治的本质规定;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牢牢掌握了生态政治的根本保证;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准确界定了生态政治的实践主体; 始终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 科学谋划了生态政治的战略布局;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拓宽了生态政治的全球视野。从学术史层面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原创性贡献, 可以为当下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政治品格提供学理支撑, 并推动生态政治学“从西方到东方”的研究转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原创性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4)04-0001-10

DOI: 10.16493/j.cnki.42-1627/c.20240627.001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 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 样样是政治, 样样离不开政治”^[1]。生态文明建设是党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赋予生态问题以重大政治问题、重大社会问题的定位,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2] (P11)}, 里面有“很大的政治”^{[3] (P5)}。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从讲政治的高度, 高瞻远瞩地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战略判断, “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4]。可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政治本质, 闪耀着鲜明的政治品格, 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深入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品格是当前学术界一项极其重要的理论任务, 但相关研究缺乏生态政治学学术史层面的梳理。基于生态政治学学术史的梳理, 可以增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阐释, 加深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鲜明政治品格的学理性、规律性认识。总的来说,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22V SZ055)

作者简介: 李全喜,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liquanxi163126@163.com (北京 100876); 李培鑫,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破解了西方生态政治学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意识形态遮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一系列原创性贡献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且日益表现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性生态政治理论。

一、生态政治学的西方话语与叙事危机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生态政治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人与自然矛盾充分暴露之后形成的。如果说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面向是以“精神觉醒”或“情感反思”的方式促使人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生态问题的产生归结为人的认知失衡，那生态政治学则是质疑以往生态学研究的政治性质^[5]，力求对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以“生态危机的有效政治应对”为学科目标。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通常被视为生态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受其影响，欧美国家内部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生态政治理论与实践运动。这也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生态环境议题从边缘性议题转变为一项中心性议题，为了争夺潜在选民与扩大政党影响力，出现了将“绿色转型”作为自身施政重点的绿色政党。在国际范围内，生态政治的热度也节节攀升，各类绿色主题的国际会议展现出人类为生态救治而做出的政治努力，生态政治逐渐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构成。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和话语权强势，导致当前在国际上居于统摄地位的生态政治学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西方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构成主要包括生态政治理论、绿党与环境运动、生态管治与公共政策、国际环境政治等部分^{[6] (P2、3)}。生态政治理论是核心，其他部分可以被视作生态政治理论在不同生态议题下的具体表现。在自身的理论演进中，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形成了三大代表性的话语流派，分别是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话语、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话语和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话语^{[7] (P36-49)}。其中，“浅绿”话语主张通过科技升级和市场优化等技术主义策略来进行生态修复，回避资本逻辑与可持续经济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由于贴合资本增殖的逻辑，“浅绿”话语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认同，其影响力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之中不断攀升。在其宰制下，西方生态治理不仅未能触及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反而通过转嫁生态矛盾引发了世界性的新殖民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

从全球生态问题日益恶化的现实来看，作为一门谋求生态问题政治解决的学科，生态政治学在现代西方语境下并没有实现自身的科学建构并发挥出应有的理论效力，甚至“浅绿”话语使生态政治学丧失了超越性而日趋庸俗化，堕落为替资本主义辩护的“治理术”之学。进一步讲，创新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生命力，西方生态政治学存在着创新的限度问题，即创新总是要在维护现有资本主义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威的基础上来展开。正如学者罗宾·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所批评的，生态政治学研究者丧失了自身的激进立场，他们已经接受了一系列在自由主义理念下所产生的政治观念^[8]。生态政治学想要重获自身的理论生命力，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绝非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谋求生态改良的庸俗理论^[9]，“回到马克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绿色左翼学者思考生态问题的共识。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意涵与基本面向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创者，尽管这一点在生态政治学的西方

话语中被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压迫和对抗的考察限定在纯政治领域^[10]。他们关注生态问题释放出的政治意蕴与社会关怀，通过政治学与生态学的融会贯通，精准描绘出资本主义阶级矛盾与生态矛盾交织的状态，以生态视角佐证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何以必要。

由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生态政治现象理论成果的总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合理关系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指的是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生态政治思想，他们虽然没有集中论述生态政治问题，但关于生态政治的理论思考已经相当深入。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一个有着更加宽广理论意涵的“伞形”概念，囊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生态政治思想、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政治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学者的相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生态政治思想是原初性的。为廓清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本然内涵，本文从狭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意涵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维度，是随着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阐发而生成的，是随着无产阶级的诞生及其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发展起来的，普遍渗透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第一，思维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哲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哲学世界观上揭示了以实践为中介的人、自然与社会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并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制约。在思想史上，他们没有从感觉或直觉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从“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1] (P501)}出发，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为线索将自然历史的演进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统筹起来进行考察，将实践的主体（人）与被实践改造的对象（自然界）联系起来，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将自然概念从纯自然的范畴解放出来，开辟了自然的社会历史维度。就此，他们将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范畴与生态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量。

第二，逻辑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挖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停留于以哲学思想反抗异化现实，而是把人与自然具体、历史的关系放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下加以观照，并通过分析生产方式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来挖掘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他们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架构——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将生态资源转化为资本形式，实现了“生态资本化”^[12]，这种生态资本化进一步“以制度之名”而具备了权威性和合法性。由此，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对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历史性否定，而将未来社会的主要任务界定为在更高层次上恢复这种原初统一性。

第三，终极诉求：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对生态政治变革与生态文明社会的谋划。政治变革反映的是由于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对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必然要求，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生态问题并非无法解决，而是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彻底变革，“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3] (P561)}。他们构想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制度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政治因素的公有制得以介入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资本盲目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性将被克服。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过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中来求解生态问题，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分析等多种方法，以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为主线，从生态学（人与自然）与政治学（人与人）的立体结构中探讨了实现人类生态解放

的原则和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基本面向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政治学”之间是高度融通的，作为一个理论或学科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学科科学性和价值立场的有机统一。这种融通性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三个基本面向中得以体现。

第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面向未来的学科。生态政治学自产生伊始，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将生态救治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可是，西方生态政治学其政治意味不断“退却”，在其影响下，西方社会并没有实现全面绿化，而且仅有的绿化与西方倾销生态矛盾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例如，当今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进行重新分配，而这必然会触及发达国家的政治优势地位——西方生态政治学却“主动避开”这些理论问题，忽视生态问题与阶级群体、特权排斥（Privilege Exclusion）之间的关系，而更热衷于探讨一些技术性缓和举措。究其原因，西方生态政治学在根本上是源自西方中产阶级精英阶层的生态觉醒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政治实践^[14]，在理论构建中未能摆脱资本主义权力体制的约束，只能从一种激进的、带有浓厚绿色左翼色彩的“未来政治”蜕变为保守的“妥协政治”。如今的生态政治学要重获自身的生命力，必须回归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范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面向世界的学科。西方很多学者仍在质疑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效力，他们声称，马克思秉持“唯生产力论”^{[15] (P158)}，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苏联、东欧的生态治理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实际上，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差异。从生态政治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丰富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由此，才能与依然处于话语强势地位的欧美学界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为中国自身生态话语的主流化奠定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面向中国的学科。生态政治学源自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实践相结合会表现为不同的理论样态。在意识到西方生态政治学不具备生态救治的实际能力后，一些国外左翼学者结合欧洲和拉美的劳工运动、工人自治主义运动，创新性地提出了“工人阶级生态学”（Working-class Ecology）^[16]、“气候阶级斗争”（Climate Change as Class War）^{[17] (P8-35)}等概念范畴，将生态问题与帝国主义霸权批判联系到了一起。类似地，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是中国学者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而形成的创新成果。当前，中国本土的生态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中“返本”，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考证与再阐释，力求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延续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18]；二是“开新”，即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19]；三是“对话”，广泛引介、转换、吸收西方生态政治学尤其是其中“红绿”话语的有益元素^[20]。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佳范例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原创性贡献，体现出“返本”“开新”与“对话”的综合运用。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构建了内涵丰富、结构完整、逻辑缜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关于生态政治的思

考与分析,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国家与社会层面的生态政治建设提出现实方案。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既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为方法,沿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理论思维范式来分析现实问题;又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从理论形态逐渐发展为实践形态——在治国理政完整的、活生生的政治过程中明确了生态政治的本质规定、根本保证、实践主体、战略地位和全球视野,以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真正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科学生态政治学的科学实践”^[21]。

(一) 深刻揭示生态政治的本质规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界定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如果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那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然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这从生态政治的视角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原理。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在“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2] (P35)}“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22] (P272)}等相关论述中,强调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质性规约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前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谋划与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目标是内在一致的。习近平指出,自然资源以及相关的生态产品是由全部社会成员所共享的,具有典型的公共性,这个公共性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共性,即劳动者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联合起来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共同占有,“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做主人,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22] (P248)}。公有制是广大劳动人民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如果自然资源与生态产品私有化,不仅会导致大多数人的生态权益遭受损害,而且会危及社会稳定和执政合法性。进一步讲,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和特征,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除了需要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约束,而且要考虑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等重要观点,用以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力对于生态文明的支撑意义。第二,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真正践行需要彻底突破资本主义的制度局限,“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显然是一个伪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大格局”中统筹考量生态文明建设,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长远性和开创性的工作,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永恒生态困境。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原则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论断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即生态文明建设“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与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主义的生态修复有着根本区别;又表明了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模式生态意蕴的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二) 牢牢把握生态政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3] (P4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生态文明问题上,党的领导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22] (P21)}。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障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最大受益者，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高政治位阶”。用比较的眼光看，与西方易受利益俘获且带有明显妥协性的绿色党派不同，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自身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当中，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的落实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具备沉稳的战略定力和高度的生态自觉，这是西方生态政治的变革主体所无法比拟的。在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作用的同时，党也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提升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勇于自我革命、以政治清明促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党内法规的出台，不断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努力提升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以打造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此外，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还具有更加宽广的理论意涵，比如说，坚持“党的领导”就意味着坚持社会主义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等等，这些质性约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

（三）准确界定生态政治的实践主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立场是知识生产的起点。从生态政治学学术史来看，不同学术流派的政治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浅绿”话语从资本集团的利益出发，其理论主张是为了使资本获得更有利于自身增殖的自然环境空间；“深绿”话语将生态问题的解决诉诸宗教人士、民间环保团体、动物保护组织等少数群体的运动式抗争，不具备介入现实政治架构的能力。秉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则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其生产实践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也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有赖于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亲自然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准确界定了生态政治的实践主体，回应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

就“为了谁”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24] (P359)}，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为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自觉而开启的。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提出“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25] (P190)}，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最基本的民生底线、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切实解决损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一切的根本在于确保人民群众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保障人民群众共同享有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就“依靠谁”而言，人民群众是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政治各环节的积极性，使生态文明建设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围绕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的问题，习近平强调，要通过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法规、加强环境监管与治理、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举措，保障生态民主，切实捍卫人民的生态环境权益，激发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广泛吸纳人民群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来，克服西方生态治理的“个体觉醒”困境。当前，广泛的生态文明公众参与体现出社会大众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与内化，这意味着带有“宏大叙事”特征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自为的行动，以及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

（四）科学谋划生态政治的战略布局：始终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

生态政治还涉及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如何在国家政权中凸显生态议题重要性的问题。

在哲学史上，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神话”的扬弃，马克思界定了国家的本质，“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11] (P584)}。国家一方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具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即基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公共交往中维持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2] (P24)}。为了突出强调生态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避免生态议题在政治的代际传递或层级传递中被消解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来认真对待，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纳入国家议题、作为基本国策、融入国家发展的各环节，作出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论断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层面回应了为什么要从政治高度去看待生态问题，以及如何从政治高度去解决生态问题。

就前者而言，我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本质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生态环境的退化将会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稳定，事关政治安全、民心向背与事业成败。因此，必须将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体现出党中央对生态问题的“升维”思考，超越了西方对生态问题的技术主义解读范式。

后者则涉及具体的生态政治解决方案，包括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设计、政府的绿色转型以及环境法治建设等，体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政治方法论意蕴。具体来说，第一，在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确保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开创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新局面。这是一种基于生态理念的综合性社会重构或转型，具有显著的“新政治意蕴”。第二，在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设计方面。作为“稳态”的政治架构，制度是衔接价值目标和治理实践的关键环节，生态政治的理念必须被锚定在制度中才能具备实现的可能性。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丰富和扩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生态蕴涵。不同于一些国家象征性的环保政策，“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2] (P176)}，习近平充分认识到制度设计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将生态文明理念注入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等效能转化机制，真正把理论的先进性转化为实践的执行力。第三，在政府的绿色转型以及环境法治建设等方面。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得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法律法规的有效保障以及各级政府积极而有效的行政管理。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积极联动，将生态文明融入政府建设各方面，不断加快政府生态化转型，严格落实生态决策、生态考评、生态问责机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夯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五）拓宽生态政治的全球视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方案，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特征与无产阶级如何在国际主义联合中实现自身解放进行了相当多的思考。他们发现，资本不会局限于狭小的市场而力图向更大的空间扩张，此时，共产主义需要各文明国家联合的行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扫除“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1] (P538-539)}。通过国际联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合作应对生态危机是国际生态政治演变的内在要求，“世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会自动地团结起来。然而，团结是必须的；如果我们希望避免生态和人类的大灾难的话，就必须创造团结”^{[26] (P15)}。当前，国际生态政治合作并非处于一种牢不可破的稳定状态，地缘政治因素催生了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与信任赤字，各国之间面临着严重的生态政治分歧，部分西方国家借此打“气候牌”、出台碳关税政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在此背景下，全球生态正义呼唤着跨地域的、全球性的生态共同行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22] (P92)}。这一科学话语建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既认识到不同国家在全球生态问题上的处境差异，又尝试凝聚和扩大各国在生态议题中的互惠性和包容性，其超越性在于“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开拓一条新的、更具有生命力的道路”^[27]。在习近平看来，国际生态政治要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关照全世界深受生态非正义影响的普通民众，决不能为了个人或某一团体、某一国家的私利而损害地球生态安全，这体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关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要主动将自身置于世界历史的宏大语境下，积极地在国际比较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世界各国和各行为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度，力求唤起所有国家的责任共担共谋。

四、总结与展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原创性贡献，内涵丰富、立意深远、自成体系，有其合理自洽的内在结构。需要把握其主题、重点与主线。

其主题是：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理论统摄。在原创性贡献体系中，在社会主义原则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与理论统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能够反映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依托、本质要求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规范性和政治性。这意味着，无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进行怎样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都不能离开对社会主义政治取向的坚持与遵循，都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制度框架。其重点是：以党和人民的互动关系为关键抓手。任何一种生态政治变革的真正施行都需要政治领导力量和政治行动主体，政治领导力量发挥着统筹全局、指挥决策的作用，推动少数人的示范引领扩展成为大众性事业；政治行动主体则需要遵循规范、践行责任，在政策推行与落实中积极发挥创造性。这也是对困扰西方生态政治学已久的“绿色变革施动者难题”^{[28] (P149-164)}的回应。其主线是：以生态政治变革的全要素全过程为主要脉络。总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原创性贡献，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之下，涵盖政治认知、政治动员、政治回应、政治战略与决策，囊括生态政治过程的全方位链条与环节，是“承接历史—观照现实—面向未来”的结果，在活生生的政治过程中构建出科学完善的生态政治现实样本。

总之，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构建并不意味着自身持有“价值中立”的立场，也不意味着要采取怀疑主义的方式去质疑生态政治学既有的全部理论，而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更加科学地描述、解释和解决生态问题。对中国来说，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理论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生态现代化的国家面临着政治稳定与生态保护双重任务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内学界在生态政治学领域内“求真”乃至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政治知识体系的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的创新发展和理论标识，其原创性贡

献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学知识生产,为破解当下中国生态话语的“阐释焦虑”困境提供了科学范例。当然,作为一门发展潜力极大的“未来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是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包容性的,与不同地区的实践相结合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以一种“中国方案”的样态发挥理论效力、提供理论借鉴,为全球范围内生态问题的政治解决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J].求是,2022(16).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4] 习近平.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求是,2024(1).
- [5] 余敏江,王磊.环境政治学: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J].人文杂志,2022(1).
- [6] 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 [7] 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8] Eckersley, R. Green versus ecosocialist economic programmers: The market rules OK?[J].*Political Studies*, 1992(2).
- [9] [英]约翰·巴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生态学[J].杨志华,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2).
- [10] 王代月.普遍性的现实转向: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理性批判思想研究[J].教学与研究,2021(7).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胡建东.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现代化道路比较视野下的“生态资本”[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王雨辰.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嬗变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J].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4).
- [15] [英]特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6] Barca, S., E. Leonardi. Working-class ecology and union politics: A conceptual topology[J].*Globalizations*, 2018(4).
- [17] Huber, M. T. *Climate Change as Class War: Building Socialism on a Warming Planet* [M]. London: Verso Books, 2022.
- [18] 方世南.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生态政治意蕴[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 [19] 段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政治学阐释[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3).
- [20] 郇庆治.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涵、进路及其限度[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1] 张云飞.试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2).
- [22]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5]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 [26] [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M].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 [27] 李傲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双重线索及其现实启益[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28][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M]. 郇庆治,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s

LI Quan-xi, LI Pei-xin

Abstract: Western ecological politics is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and academic discourse shaping in a specific Western context.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s, which transcends the ideological shield of western ecological politics on ecological political phenomena, is a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with distinct ideological attribut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put forward many new ideas, viewpoints, and judgments, greatly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s with a series of original achievements, showing confidence and self-awareness in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ecological politics. Its original contribu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socialist principles, profound revelation of the essential provisions of ecological politics,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PC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lying on the people to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ccurately defining the practical subject of ecological politic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greatest of the country", scientific plan of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ecological politics, collaborat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anding the global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sorting ou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distinct political charac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shift of ecological politics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Key words: Marxist ecological politic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iginal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 孙洁)